

SHUPIN

二〇一〇年·第三辑

书品

- ◎王士菁 金灿然同志二三事
- ◎容甫 关于“不得”的后话
- ◎傅璇琮 《王应麟著作集成》总序
- ◎齐东方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序
- ◎孟彦弘 明钞本《天圣令》的整理
及唐令复原的得失

中华书局

学林往事

- 王士菁 金灿然同志二三事 3
- 容 甫 关于“不得”的后话 6
- 散 木 陈寅恪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么? 13

序跋录

- 傅璇琮 《王应麟著作集成》总序 16
- 齐东方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序 20
- 胡友鸣 历史的研究与普及需要“乐之者”
——《古人·古风·苦情·古景》序 25

编撰摭谈

- 孟彦弘 明钞本《太全类》的整理及唐令复原的得失
——校录、复原的“清本”问题 31
- 崔文印 《靖康稗史》与《重刊全言》 37

评书论学

- 白化文 开垦“处”
——读《杂体诗歌概论》 41
- 赵伯陶 博观约取 考镜源流
——读《古体小说论要》 43
- 樊波成 《国语韦昭注辨正》发墨 47
- 顾 农 读《尘几录》和《烽火与流星》 56
- 徐道彬 书院与学术的双重变奏

——评《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	62
张豫之 立足写本原卷,贯通中日研究	
——《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读后	69
杨春玲 功在当代 泽被后人	
——《绍兴丛书》第二辑出版	73
櫻 宁 最后的古意	
——读《近世古琴逸话》	76
读书札记	
林宪亮 《唐语林》书名考释	78
刘志庆 读书札记三则	82
商榷篇	
向志柱 再商《鸳渚志餘雪窗谈异》的作者问题	86
尚磊明 点校本《礼记训纂》标点及字词纠谬十则	91
书苑撷英	
孙诒让著 雪克点校《大戴礼记斟补》(外四种) 姜广辉著《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黄 松 副主编:冯宝志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 彦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电话:(010)6345823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金灿然同志二三事

● 王士菁

金灿然同志的名字,最初是从黄洛峰同志口中听到的。那时我从学校毕业不久,尚未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洛峰同志说:“范文澜正在编写一部通俗性的中国通史(即后来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齐燕铭、金灿然等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金灿然同志的名字。从1952年开始,鲁迅著作编刊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在文化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见到灿然同志。当时我只对他表示一些敬意,并未仔细交谈。这是我们最初相识。

从1958年开始,《鲁迅全集》(十卷本)和《鲁迅译文集》(十卷本)出版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分工,要我具体负责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才有较多机会和灿然同志接触。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位蔼然可亲的长者。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下,他毫无某些领导人自然流露出来的派头或架子。我听见的倒是和他接触较多或在他领导之下工作较久的同志们的反映,大多数的人认为他是颇能“礼贤下士”的(礼贤下士,这是一句古话,而对于它的理解是不同的,在当时却含有讽刺的意味)。据我的体会,这大概是指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工作中,严肃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尊重一些老专家,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学识,尊重他们在整理和出版古籍工作中的作用吧。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文革”以前),在他的领导之下并和他共同协作的工作中,我亲身感觉和切身体会确是如此。

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不久即转入“三年困难时期”。当时

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相当困难的,有关领导机关虽然给一些专家学者发了一个“优待证”,解决物资供应的困难问题,但当时有些颇具幽默感的同志,戏中带谑地戏说这个“优待证”:可以购买香烟,解决“气体”问题;可以购买几斤猪肉,解决“固体”问题;也可以购买一两瓶酒,解决“液体”问题;而在实际上,困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家是并不满意的。我们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在上午吃中午饭或下午吃晚饭时散会,大家吃饭即成为问题。灿然同志提出:“由公家拿出粮票并出钱请他们吃饭。”这个办法当即得到齐燕铭同志的赞成,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就仿照这个办法执行了。可是,这竟出了“问题”。有一次,灿然同志因工作关系,从湖南请来一位著名学者马宗霍先生,他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工作完毕,特别在四川饭店请他吃饭。这本来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却引起了一位领导同志的干预。他原为文化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当时已经调到北京市作领导工作了,而他却打来电话,责问为什么在四川饭店请客,是谁出的主意?灿然同志答复说:“这是齐燕铭同志出的主意。”于是此事才作罢。

灿然同志所考虑的,一切都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的。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为例,即是约请众多专家学者,发挥集体智慧,付出巨大心血,然后完成的。如果没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这样高质量的艰巨工作的。灿然同志对于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十分尊重的,而对于一般中青年同志也是采取互相平等,互相尊重的态度,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但对于有特别身份的同志,他也不另眼看待。那时中华书局尚未搬到王府井大街36号办公,有一次,我们正在东总布胡同10号的会议室开会,忽然走来一位穿军服的女同志。灿然同志对她并不特别看待,点头示意,请她坐下,然后由一个工作人员领她出去买书。散会后,他笑着问我:“你认识她吗?”我说:“不认识。”他说:“这就是林彪同志的爱人叶群。”当时,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这是不是他的一条“罪状”?

在灿然同志的领导和协调之下,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关系是很和谐的,大约每年碰头一两次,谈一谈工作分工问题。在当时,经济效益较好的书,大都由“人文”或“上编”出版;经济效益不好的,然而又是必须出版的,大体上都由中华书局包下来。当时有不少人都认为中华书局是颇为赚钱的,连夏衍同志都戏说:“灿然同志是‘金光灿烂’。”然而据我所知,情况并非如此。当时“人文”先后出版了诗文选本多种,印数较多,经济效益都是较好的。在出书分工上,灿然同志也总是由我们先挑选。灿然同志所照顾的是全局观念,这令我十分敬佩,我们的协作是很亲密的。

当时为了完成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任务,灿然同志曾经不断提醒我们在全国内,组织专家学者完成艰巨的任务。约在1962年,他曾派出赵诚同志和我到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在西安、成都、武汉等地拜访各高等学校和文史馆的古典文史研究专家学者,动员一切力量完成此项工作计划。在灿然同志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后来我每年又在华东、中南地区,以及青岛、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地,拜访众多专家学者,特别是郭绍虞、罗根泽等前辈,在他们亲自主持和具体指导之下,卷帙浩繁的中国历代古典文学理论丛书才得以出齐。

现在,在我手头上仍然翻阅着“二十四史”、《文选》、《文苑英华》这一套套丛书,每当我翻阅这些书的时候,很自然地便想起了金灿然同志。

关于“不得”的后话

● 容 甫

关于“不得”的后话，要从邓广铭先生的一封信札说起。邓先生的信是1959年6月写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前年第一次看到，就对信中邓先生批评岑仲勉的话留有特别深的印象。因为对邓先生不了解，不知道他平常是不是就这样严厉，又不知道岑先生的对音研究到底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只是觉得邓先生说得够狠够厉害。

邓先生信是对《史记》点校后记征求意见稿的回复，档案保存的点校后记原稿，举例中有《秦始皇本纪》“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条，原文如下：

有人认为明星就是灵星，《封禅书》说汉高祖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可见以前也有过祀灵星的灵星祠而给秦始皇禁废了的。这样说，应该以“禁不得祠明星”为句，可是下面“出西方”三字就落空了，于是有人说“出”上脱一“星”字，星指彗星。近人岑仲勉认为应该以“禁不得祠”为句，“明星出西方”为句，明星就是彗星，“禁不得祠”同“明星出西方”是两回事。他有许多理由（详见岑著《两周文史论丛》），我们认为正确，所以标点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邓先生信中第3条意见针对此段说：

“禁不得祀。明星出西方。”说明中讲系根据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中之说而这样断句的，并讲岑仲勉有许多正确理由，所以依据他的意见而如此断句。实则，岑氏此说乃是从日人藤田丰八剽窃来的，乃一极端不通之谬论。因为，果如其

说,则“不得”即“浮屠”或“吠陀”,是则秦代不但佛教已传入中国,且必已为中国人民所信奉,其香火必已遍各地矣,此万万不通之论也。(“禁不得”如何,乃汉以来律令中习用语,《史记》此下容有脱文。)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

周一良先生对征求意见稿也有回复,写在一张明信片上。关于“禁不得祠”只有很短的一句话的意见:

“禁不得祠”句岑氏解说不确,日本人早已讲过,已有人加以辩驳。

《史记》点校本正式出版时,采用了二位先生的意见,删去了后记中的这条举例,但正文标点仍维持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断句(点校本 253 页)。

不久前跟一位朋友说到邓先生,我曾把邓先生信传给他看,目的是想多知道一些关于邓先生信中措辞的背景。后来一天在办公室没事,拿出书柜里的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找到那篇名为《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的文章,才知道岑先生是明确引述到藤田丰八的,也引述到马元材书,并对“禁不得”、“禁勿得”有较详细的辨析。当时我觉得邓先生说“剽窃”有点重了,周先生更宽容。

这件事留给我的疑问,到此已经基本没了,没想到又一天乱翻书,看到了季羨林先生的《扫傅斯年先生墓》,若果真如季先生所说,岑仲勉则竟然是因为“不得”而不得不离开史语所的。季先生说:

孟真先生的轶事很多,我只能根据传说讲上几件。他在南京时,开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待人宽厚,而要求极严。当时有一位广东籍的研究员,此人脾气古怪,双耳重听,形单影只,不大与人往来,但读书颇多,著述极丰。每天到所,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上两千字,便以为完成了任务,可以交卷了,于是悄然离所,打道回府。他所爱极广,隋唐史和黄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数十万言。对历史地理特感兴

趣,尤嗜对音。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样子连印度天城体字母都不认识。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积木,可以任意挪动。放在前面,与对音不合,就改放在后面。这样产生出来的对音,有时极为荒诞离奇,那就在所难免了。但是,这位老先生自我感觉极为良好,别人也无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里做了一个学术报告,说《史记》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对音,佛教在秦代已输入中国了。实际上,“禁不得”这样的字眼儿在汉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样一时糊涂,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一位颇负盛名的日本汉学家藤田丰八已有此说。老先生不一定看到过。孤明独发,闹出了笑话。不意此时远在美国的孟真先生,听到了这个信息,大为震怒,打电话给所里,要这位老先生检讨,否则就炒鱿鱼。老先生不肯,于是便卷铺盖离开了史语所,老死不明真相。

以前看陈达超先生的《岑仲勉先生传略》,说岑先生“与该所主持人发生矛盾,藉口所谓研究课题范围超越合同约束,备受打击排挤。……愤然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卷首,中华书局,1990年7月),没想到就是“不得”与“浮屠”这件事。

关于“不得”与“浮屠”的话题,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于1927年挑起的,藤田的论文刚发表,在日本就有铃木券太郎写了《藤田博士之不得祠》一文反驳他。中国学术界最早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向达先生,他在《中外交通小史》中说:“至于日本人以《史记》所载始皇‘不得祠’的话,以为‘不得祠’即‘浮屠祠’……这种种说头,不是根据薄弱,便是神经过敏,难以据为典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28页)。此后汤用彤、魏建功等先生也都著文参与了讨论。1937年,岑仲勉撰《西夜传校释》,论述“塞种”即“释迦”,特别举出《史记》之秦始皇“不得祠”一段,认为“由是以推,佛教东传,固有其机……要未能一概抹煞,且犹多研究之余地也”(《辅仁学志》六卷)。后来,岑仲勉曾明确表示,他这段话是针对向达说的。

国内最先响应藤田丰八之说的,是马元材所著《秦时佛教已流行中国考》,马元材就是著名秦汉史家马非百。马先生因为“丁酉之劫”后来也成了中华书局的编辑,直到终老。马元材此书是1943年4月设在安徽临泉的鲁苏豫皖边区临时政治学院石印的一本小册,岑仲勉从友人处借读一过,于同年10月写了《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一文,文章开篇说:“觉得此问题,表面史料固非常贫乏,但其内涵又颇为广泛,且是先秦西北交通一重要表示,国内外学人着手者尚渺,爰提出管见若干。初非达到研究地步,不过藉供将来进一层探讨者之备考或引线而已。”这篇文章发表在1944年初重庆出版的《真理杂志》(方豪主编)第一卷第1期,文末有作者附记云:

右作是最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演讲之底稿,时间有限,语焉不详,文外亦餘意未尽。倘承时贤继马氏之后,共同商讨,尚当再提供若干管见也。十一月三日再识。

这里所谓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演讲,与季先生说的“所里的一个学术报告”应该是一件事。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的话,那就得怀疑季先生所记传说的真实性了。报告在1943年,而岑仲勉到1948年才离开史语所。单从时间上看,远在美国的傅斯年“听到了这个信息,大为震怒,打电话给所里,要这位老先生检讨,否则就炒鱿鱼。老先生不肯,于是便卷铺盖离开了史语所”,就有点近于小说家言了。

1947年,岑先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一文中曾回顾自己对“不得”的认识过程,“1946年秋,在李庄史语所学术讨论会上,才确定‘不得’并非佛教而应为伊兰之火教”,改变了原有的主张,认为是伊朗的火教在秦朝传入了中国,而不是印度的佛教。也就是说,岑仲勉“卷铺盖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已经不持秦朝佛教传入中国说了。

岑先生对“不得”的探究可谓执着,1943年的学术报告引起了所长傅斯年的“震怒”,报告会后他还是写成了《秦代已流行佛教之

讨论》发表(当然是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之外的刊物),甚至导致了1948年卷铺盖走人。改变旧说后,1947年6月岑先生又写成论文《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收入1958年的《两周文史论丛》出版,最后让宋云彬引用于《史记》点校本后记,又挨邓先生一顿骂。岑先生“老死不明”的“真相”也许还不止这些。

某日因别的事情查阅《新学术之路》,突然想起岑仲勉,发现这本史语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竟没有一篇关于岑先生的文章。据书的序言,本书文稿86篇,涉及传主77人,并非全都是史语所的正式成员,其中不少只是与史语所有关系的人。岑仲勉于1937年由陈垣先生举荐入所,在史语所工作十一年,按理说不该没有他。不知道是岑仲勉不够“新学术”,还是“不得”的后遗症?如果是后者,那也太长了,1948~1998,整半个世纪了。

史语所傅斯年档案已经完成整理,一些传说纷纭的事情应该不难查实。岑仲勉在史语所工作期间,他自己说是“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单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刊载的论文就达七八十篇,发表论著之多、涉及范围之广,用空前绝后来形容恐不为过。从傅、岑二位1945年的往还书信看,分歧主要在是否遵循约定的研究范围。傅斯年1945年2月22日致岑仲勉函云:

大著有调查□释名一文,此不在先生研究范围之内,已代为删去,乞谅之。又《元和姓纂》及注、《突厥集史》两大书,可否集中精力,先成其一,未知以为何如?

3月26日又致函云:

我辈既在第一组(史学),其所治学范围自应以第一组为限,先生所示今年工作,有突厥古文一事,如先生之工作范围能以史学为限,而不涉及语言,则弟公私均感幸。冒昧陈之,希亮察。

岑仲勉3月28日回复傅斯年函云:

现拟计划只求突厥人地名之还原，古突厥文之事，信口道之，令尊处有所误会耳。至问学方法，为国家计，巩固西北自应混成一家，敢布腹心，惟希亮察。

傅斯年3月31日复岑仲勉函云：

函达。大雅风度，感佩无似！先生治学之精，尤为感佩，高怀隆谊，何日忘之，此意当终身佩之耳。

往还之间，有要求，有理解。抗战胜利，傅斯年代长北大，9月10日岑仲勉致函祝贺，并附《元和姓纂四校记》目录云：

得讯代长北大，至深忭贺，贵体近状如何？念念。自本年一起《姓纂校记》即赶编，附呈目录乙纸。

1948年7月5日傅斯年致岑仲勉函云：

函达。先生治学之精勤，佩服无间，所示抄写各费，均当遵命。大驾行前理应致送若干月薪水，已托作铭兄转请萨先生核定。以后敬乞时赐教言。

此信写于岑仲勉离所之际，传说中的傅、岑矛盾和离所风波，与傅、岑通信中的谦怀与温文，真不啻河汉云泥！

牟润孙先生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感言》中也写到这件事，近于事实，合乎事理。他说：

至于聘用人员，他是非常严格，没有丝毫的徇情。岑仲勉他从来不认识，陈援庵先生看见岑的文章以为极难得，推荐给傅先生，傅先生也觉得好，便聘为研究员。岑到史语所果然作出了不少成绩，后来因为岑先生兴趣过泛，研究的方面太广，有时难免犯了错误。傅先生劝他少写，岑不肯听，终于胜利后不久离去。从这一用一去之中，就可以看出傅先生的认真。（《海遗丛稿》二编，187页，中华书局2009年）

凑巧的是，在岑仲勉离所后，1948年12月2日，陈槃先生撰写了题

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的论文,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本第一分(1949年12月),文末所附《岑仲勉先生说摘附》有“最近,陈君槃庵复检数例见告”云云,是岑仲勉对陈槃所举示例证的回应。这件事或许可以作为傅斯年“认真”的注脚,也可以作为岑仲勉同样“认真”的佐证。

2008/7/1 初稿

2009/4/18 改写

新书《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出版

(岳南著,中华书局2010年2月,35元)

本书以中研院从组建到逃亡台湾这段历史为线索,描述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陶孟和、叶企孙、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梁思成、林徽因等知识分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不懈努力,生动再现这批学术精英在艰难困苦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同时披露中研院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对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以独特的视角进行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真相再度鲜活起来。

陈寅恪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么？

● 散 木

自从“陈寅恪热”之后，书肆或者报刊上关于陈寅恪题材的图书和文章不时可见，这相较此前数十载的“陈寅恪冷”，固然令人可喜，不过，索之言而有据、发人深省的原创性读物，却不是很多。

且说一例。陈寅恪早年曾随兄东渡，留学日本，期间与鲁迅相识，于是有众多写家宣称：陈寅恪与鲁迅曾共读日本东京宏文学院，期间还有密切交往。持此一说的，有《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寂寞陈寅恪》（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如《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称：“陈寅恪与鲁迅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时就是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后来鲁迅在文坛的地位如日中天，在社会各阶层也极具影响力，然而陈寅恪却由于政治上的不受信任而跌落人生低谷，尽管如此，他却从未向人提起过他与鲁迅的交情，也没有顶着‘鲁迅故交’的‘帽子’明哲保身，更没有寻求鲁迅的声援，而是凭借自己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笔耕不辍的勤奋跃出低谷并修成正果，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名气越来越大……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是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作者是借此表彰陈寅恪的独立人格和操守，不过，陈寅恪与鲁迅是否有过“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经历，以及他晚年是否有过如此这般的“解释”，或者说此话出处见诸何处等等，对心重的读者如吾辈而言，却是只有狐疑，因为所谓“密切交往”等等，索之草蛇灰线，必有行迹，要么是当事人的见闻，要么或者是当事人诉诸于文字形式的记录等等，但据笔者的揣测，恐怕这线索是难以

觅得的。

关于陈寅恪题材的书籍,可以依赖的,是海外汪荣祖先生的一册《史家陈寅恪传》(香港波文书局 1975 年初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4 年二版以及 1997 年修订版、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大陆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新版),汪本文字简约,不事铺陈和发挥,所以,对传主初次留学日本一事,只有寥寥几字,当然也不提与鲁迅关系一事。蒋天枢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记亦甚简约,其梗概只是陈氏 13 岁时随兄东渡,1904 年 15 岁于假期返宁,随即又与其兄陈隆恪考取官费留日,入庆应大学,后转东京帝大财商系,翌年因脚疾返国,至 1907 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凡此,陈寅恪留学日本的时间总共不过四载,期间与鲁迅的交往,以二人年龄相差十岁(彼时,陈衡恪 27 岁,鲁迅 22 岁,陈寅恪 12 岁),以及当时彼此的兴趣趋向等等,估计不尽相同,可能也极其有限,如此,焉得有“密切交往”一说?

此外的几本陈氏传记,如《学界泰斗陈寅恪》(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言及陈寅恪与鲁迅曾同窗(以及林伯渠等),但未言及“密切交往”;吾友刘克敌兄的《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并非传记类读物,可以不论。总之,考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一次到日本游学,应该是与鲁迅同船(是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后,与其他几位同学被派往日本留学。3 月 24 日,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鲁迅等乘日轮“大贞丸”号由南京启程赴日。陈衡恪是鲁迅矿路学堂的同学,陈寅恪是跟随长兄陈衡恪、又在其舅父俞明震的护送下作为自费留学生同行去日本的)。当时鲁迅是公费生,同船的陈氏兄弟则是自费生,至于陈寅恪抵日后进了什么学校,应该有可能是东京弘文学院(又称“宏文学院”),当时鲁迅被编入普通江南班,陈氏是什么班,不可考,估计《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会有记录。鲁迅的文字中,对陈寅恪只有一条赠书的记录(《鲁迅日记》1915 年 4 月 6 日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

集,《炭画》各一册。”这是鲁迅回国后与陈衡恪共事北京教育部时的事情了。因而陈寅恪与鲁迅两人的交往,似仅此而已)。后来抵达日本留学的周作人的回忆,也只有对其兄陈衡恪的记忆(所谓“鲁迅、张协和、伍习之和顾石臣,加上随同前往的自费生,俞总办的亲戚陈师曾,都改进了弘文学院了”等等),没有提及陈寅恪,陈寅恪自己的回忆,只有《乙酉冬卧病英伦医院》一诗序中所言“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等等。至于后来几部记述陈寅恪的书籍,提及传主留学日本时的情事,基本上都是参照鲁迅的行迹来附会的,也就难称不移之论了。

陈寅恪与鲁迅的话题,其实只是鲁迅与陈衡恪的话题带出来的。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他是著名画家,也是鲁迅的至交,当年在日本弘文学院,鲁迅与陈衡恪同住一舍,可谓朝夕相处。1904年春,鲁迅和陈衡恪等曾联名给返国的同学沈颀民(杭州“求是书院”毕业生。该书院即今天的浙江大学的前身)写信,介绍弘文学院及同学们的近况。后来沈颀民回忆说:“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给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如果说这对陈寅恪产生了影响,也是从侧面而来的。民国后,鲁迅与陈衡恪同在教育部任职,两人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当时鲁迅喜艺术,陈衡恪擅长篆刻、书画,因而深得鲁迅所喜,《鲁迅日记》记载的陈衡恪,就达七十多笔。

《王应麟著作集成》总序

●傅璇琮

王应麟博学多才，著作宏富，其学术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于《困学纪闻》提要，称“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实际则不仅仅是宋代，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王应麟堪称第一流学者。如梁启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称“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

《宋史》卷四十八王应麟本传，详细著录其著作之书名、卷数，共二十三种，六九五卷；后清人张大昌为其所作之年谱，又补录八种，四十九卷，则共为三十一一种，七四四卷。个人著作如此丰多，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史上，当亦为首列。不过元明时期，其著作甚多佚失。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则较为完整辑集其所存之著，今据该书所辑，列为：《周易郑康成注》一卷，《诗考》一卷，《诗地理考》六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汉制考》四卷，《汉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答问》五卷，《六经天文编》二卷，《困学纪闻》二十卷，《玉海》二百卷，《词学指南》四卷，《小学紺珠》十卷，《姓氏急就篇》二卷，《四明文献集》五卷，共十四种，二八四卷。这十四种，涵括经史子集四部，又涉及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文献目录等。王应麟视野开阔，博学多识，确可称为通儒。

应当说，博大精深，构成了王应麟学术体系的鲜明特色。其最著名的两书，《玉海》二百卷，大型类书，囊括天文、律历等二十一门，元人李桓称其“网罗天下之见闻，包括古今之故实”（元刻《玉海》序）；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赞誉“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